

董事网络与企业社会责任鉴证的示范效应

——基于模仿压力理论的实证检验

孙维章¹, 耿艳丽¹, 杨金凤², 吴树畅¹

(1. 山东工商学院 会计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5; 2. 山东建筑大学 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1)

[摘要]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CSR)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 CSR 鉴证在董事网络中的示范效应。利用 A 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董事连锁企业的 CSR 鉴证对 CSR 披露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引入强制披露压力作为调节变量,发现外部压力强化了 CSR 鉴证的示范效应,从而为模仿压力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董事网络;CSR 鉴证;扩散效应;连锁董事;模仿压力理论;示范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1)05-0053-08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社会对企业的广泛要求,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的客观需要,其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发布独立 CSR 报告的份数从 2009 年的 314 份迅速增加到 2018 年的 851 份。而且,发布独立 CSR 报告的企业中,非国有企业和自愿性披露企业都占到较大比例。CSR 披露快速发展的动因是什么? CSR 鉴证是否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在中国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研究这些问题更具现实意义,既可以检验政策的影响和效果,也可以为企业 CSR 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现有研究发现董事网络促进了特定行为的跨企业扩散^[1-6],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上市公司 CSR 披露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部分企业的示范作用。模仿压力理论认为模仿行为源于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7],企业的主要动机是避险。基于模仿压力理论,董事网络中的行为扩散主要源于外部压力,但外部压力对董事网络的具体影响机制还未得到深入研究。本文拟在董事网络扩散效应研究的基础上,研究 CSR 鉴证在董事网络中的示范效应。

二、文献综述

(一) 董事网络的扩散效应:概念与进展

董事网络也被称作董事联结、董事连锁等。与老乡、校友等关系构成的高管网络不同,董事网络由连锁董事构成。连锁董事是指在两家及以上公司董事会任董事职位的董事。谢德仁和陈运森将董事网络定义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个体以及董事之间通过至少在一个董事会同时任职而建立的直接和间接联结关系的集合^[8]。董事网络中行为扩散的基本路径是“董事会 A - 连锁董事 - 董事会 B”。基于此,本文总结

[收稿日期]2021-0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CGL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9YJC630147);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ZR2020QG021);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BJC17);山东工商学院财富管理特色建设研究项目(2019ZBKY065)

[作者简介]孙维章(1985—),男,山东阳谷人,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责任报告,邮箱:prog1@163.com;耿艳丽(1985—),女,山东淄博人,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诚信;杨金凤(1988—),女,黑龙江伊春人,山东建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与审计;吴树畅(1968—),男,江苏邳州人,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

现有文献将影响董事网络扩散效应的因素分为四类:(1)外部环境因素。公共政策、市场竞争等因素导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模仿压力,从而对扩散效应产生影响。不确定性越高,扩散效应越强^[9]。(2)输出方因素。主要涉及结构洞和输出方企业的网络影响力,结构洞越多、影响力越大,扩散效应越强^[8-10]。(3)董事联结因素。连锁董事和连锁关系的相关因素,包括内部地位和资历、联结广度、外部地位、地区差异等。(4)输入方因素。包括输入方企业规模、股东特质、公司治理等。

(二) 模仿压力与扩散效应的形成

董事网络带来的模仿压力是造成扩散效应的主要原因。Dimaggio 和 Powell 认为不确定性是模仿行为的关键成因,通过模仿同群企业的行为,相关企业可以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获得低成本的可行方案^[7]。根据模仿压力理论, Galaskiewicz 和 Wasserman 进行实证检验并发现管理层特别倾向于模仿同一网络中其他组织的行为,这种跨组织的行为模仿造成了组织行为在网络中的扩散^[11]。也有观点认为,董事网络不仅带来模仿压力,而且也是一种沟通机制。董事网络充当了信息的传输渠道和知识与市场经验的学习平台^[1,12-13]。基于此,董事网络为企业获取信息、知识和经验提供了一个便捷且低成本的渠道,进而降低了决策成本,改善了决策质量。因此,与这些信息、知识和经验有关的企业行为更容易被模仿,并在董事网络中扩散。

现有文献对董事网络扩散效应的研究涉及多种企业行为,前文已述,但这些文献对扩散效应的内在机制缺少分析。模仿压力理论强调了外部不确定性的影响,但对外部不确定性缺少深入、具体的研究。鉴于中国 CSR 的迅速发展,本文将以 CSR 鉴证为切入点,研究 CSR 鉴证在董事网络中的示范效应,并引入强制披露压力来解释这种示范效应形成的内在机制。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 CSR 鉴证、声誉与竞争优势

1. CSR 报告与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认为 CSR 披露有助于企业获取战略资源、建立竞争优势。现有研究发现 CSR 披露在融资成本、分析师预测误差以及现金流量等多方面带来积极影响,并带来企业价值的上升^[14-17]。Dhaliwal 等发现披露 CSR 活动信息的公司,其股权融资成本明显下降^[14],这种相关性在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国家更为明显^[15]。Plumlee 等的研究则显示,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从现金流量和股权融资成本两个方面影响了企业价值^[16]。Matsumura 等研究了碳排放量以及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虽然碳排放降低了公司价值,但披露碳排放信息的公司其公司价值显著高于未披露这一信息的公司^[17]。

2. CSR 鉴证与声誉。基于合规、同行模仿和治理专业性等原因,企业会进行 CSR 鉴证^[18-19]。由于能够在监督约束、风险评估与咨询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鉴证提高了 CSR 报告质量^[20]。张正勇和戴泽伟发现专业机构的鉴证会增强 CSR 报告的可靠性^[21]。CSR 披露传递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相关信号,增强社会责任表现的信息披露与企业声誉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提升了企业声誉^[22-23],从而有助于企业建立竞争优势。CSR 鉴证提高了 CSR 报告的质量、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强化了 CSR 报告的信号功能,从而增强了 CSR 披露的竞争优势效应。尤其是 CSR 披露与投资相关程度较高时,投资者出于对管理层自利等问题的质疑,更加重视 CSR 鉴证。事实上,降低代理冲突和传递信号不仅是上市公司自愿披露鉴证报告的主要动机,也是其自愿提高鉴证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动机^[24]。

3. CSR 鉴证的作用:经验证据。一些现有研究为 CSR 鉴证的积极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张正勇等研究发现 CSR 报告鉴证能降低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预测分歧度^[25]。张正勇和邓博夫发现 CSR 报告鉴证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特别是那些财务信息透明度较低、财务业绩较差的企业^[26]。朱文莉和许佳惠发现由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的 CSR 鉴证、依据规范的鉴证以及连续开展的鉴证可以显著降低审计风险和审计费用,国有企业与敏感性行业的企业开展 CSR 鉴证可以显著降低审计风险和审计费用^[27]。

(二) 董事网络与 CSR 鉴证的示范效应

CSR 鉴证和 CSR 披露决策都是 CSR 披露的内容之一。通过董事网络,企业既可能学习好的行为^[13],也可能学习坏的做法^[28],CSR 鉴证为何能通过董事网络影响 CSR 披露质量呢,主要原因在于 CSR 披露有助于企业规避风险、获得竞争优势。

根据模仿压力理论,企业会模仿与其关系密切的其他企业的行为^[11]。模仿行为可视为羊群效应,其本质是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规避^[7]。现有研究发现,CSR 披露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一种风险应对的策略^[29]。通过模仿董事连锁企业的 CSR 披露行为,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与 CSR 有关的风险。进行 CSR 鉴证的企业,其社会责任绩效往往较好,因此可能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从而促进董事连锁企业的 CSR 披露质量。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连锁企业的 CSR 鉴证会正向影响 CSR 披露质量。

(三) 强制披露压力与 CSR 鉴证的示范效应

制度因素包括法律法规、社会规范、文化认同等多方面内容,是影响 CSR 披露的重要因素^[30]。制度因素在多个层面上塑造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第一,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法规差异,CSR 披露的基本形式存在差异。第二,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也会影响 CSR 披露。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企业经济实力较强,逐渐形成企业参与慈善和承担社会责任的风气,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企业 CSR 披露质量的提高。

根据上交所和深交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四类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披露 CSR 报告,即纳入“上证公司治理板块”的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金融类公司和纳入“深证 100 指数”的上市公司等四类上市公司。由于受到强制性披露压力,这四类企业比其他企业面临更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如果 CSR 披露不合规,他们会受到监管部门的惩罚。如果 CSR 披露质量过低,还可能引起不良的市场反应。因此,强制性披露压力会推动董事网络中的企业向“好榜样”学习,从而强化了 CSR 鉴证的示范效应。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强制披露压力会强化 CSR 鉴证的示范效应,即连锁企业的 CSR 鉴证对强制性 CSR 披露质量的影响更大。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

中国上市公司独立披露 CSR 信息始于 2006 年,2008 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发布有关 CSR 披露的指导意见。为了避免政策变更带来的影响,我们剔除了 2008 年之前的样本数据,研究期间为 2008—2017 年。样本包括了所有披露 CSR 报告的 A 股上市公司。公司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宏观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与 CSR 披露质量有关的数据来自 RKS 数据库。剔除资本结构比较特殊的金融公司样本和数据不全的样本之后,共有样本 5125 个,自愿披露 CSR 报告样本 1928 个,强制披露 CSR 报告样本 3197 个。所有的连续型变量都进行了 1% 分位上的 Winsor 缩尾处理。

(二) 变量选取

1. 因变量

本文选择 CSR 披露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CSRQ*)。本文采用润灵社会责任评级(RKS)来衡量 CSR 报告的质量。润灵社会责任评级是由第三方机构推出的 CSR 披露质量指数。这项指数从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和行业性四个维度评价了 CSR 报告质量。每个维度包含若干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共 15 项,包括 CSR 战略、股东、雇员和人权、公平经营等多个方面。二级指标共 63 项。考虑到润灵社会责任评级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我们采用这一指标衡量 CSR 报告的质量。

2. 自变量

借鉴 Chiu 等和 Cai 等的研究^[1-2],本文采用一个虚拟变量(*BI_Assurance*)来表示董事连锁企业的

CSR 鉴证。当某上市公司的董事网络中至少有一家连锁企业发布了经鉴证的 CSR 报告, $BI_Assurance$ 为 1, 否则为 0。

3. 调节变量

本文引入强制性披露压力作为调节变量 ($Mandatory$), 来检验外部压力对 CSR 鉴证的示范效应的影响。当某上市公司属于上交所和深交所规定的四类需强制披露 CSR 报告的企业时, $Mandatory$ 为 1, 否则为 0。

4. 控制变量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外资股比例、政治关联、广告强度、重污染行业、资产负债率等变量^[31]。此外, 本文在回归分析过程中还对年度和行业变量进行了控制。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表

名称	符号	量化方式
CSR 披露质量	$CSRQ$	润灵社会责任评级
董事连锁企业的 CSR 鉴证	$BI_Assurance$	当某上市公司至少有一家董事连锁上市公司发布了经鉴证的 CSR 报告时取 1, 否则为 0
强制披露压力	$Mandatory$	属四类需强制披露 CSR 报告的企业时为 1, 否则为 0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取对数
外资股比例	$Fshare$	外资股占总股份数的比值
政治关联	PC	CEO 曾任职于政府机构或为人大代表或为政协委员时为 1, 否则为 0
广告强度	AD	销售费/总资产
重污染行业	$Pollution$	属于重污染行业时取 1, 否则为 0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三) 模型与方法

为了验证假设 1 (H1), 我们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检验 CSR 披露质量和董事连锁企业 CSR 鉴证之间的关系。模型如下:

$$CSRQ = \beta_0 + \beta_1 BI_Assurance + \beta_2 Controls + \varepsilon \tag{1}$$

为了验证假设 2 (H2), 我们将调节变量 $Mandatory$ 加入模型 (1), 新的模型如下:

$$CSRQ = \beta_0 + \beta_1 BI_Assurance + \beta_2 BI_Assurance \times Mandatory + \beta_3 Mandatory + \beta_4 Controls + \varepsilon \tag{2}$$

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膨胀系数 (VIF) 介于 1.01 和 5.48 之间, 意味着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五、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 2 根据研究假设分三部分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CSR 披露质量 ($CSRQ$) 平均得分 38.82, 仅略高于最大值的 50%, 说明整体披露质量还有待提升。董事连锁企业的 CSR 鉴证 ($BI_Assurance$) 均值分别为 0.045, 说明上市公司进行 CSR 鉴证的比例较低。 $Mandatory$ 均值为 0.624, 说明强制性披露 CSR 的上市公司占比较高。从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 $CSRQ$ 与 $BI_Assurance$ 显著正相关, 说明董事连锁企业的 CSR 鉴证对 CSR 披露质量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个结果为 H1 提供了初步的证据支持。

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	(2)	(3)	(4)	(5)	(6)	(7)	(8)	(9)
(1) $CSRQ$	38.821	12.257	18.86	75.887	1								
(2) $BI_Assurance$	0.045	0.207	0	1	0.172*	1							
(3) $Mandatory$	0.624	0.484	0	1	0.066*	0.060*	1						
(4) ROA	0.064	0.053	-0.096	0.249	-0.018	-0.047*	0.019	1					
(5) $Size$	23.063	1.416	20.326	27.035	0.478*	0.210*	0.343*	-0.084*	1				
(6) $Fshare$	0.034	0.094	0	0.459	0.227*	0.127*	0.147*	-0.024	0.297*	1			
(7) PC	0.166	0.372	0	1	-0.051*	-0.018	-0.022	0.098*	-0.037*	0.031*	1		
(8) AD	0.038	0.054	0	0.285	0.044*	-0.039*	-0.055*	0.259*	-0.172*	0.014	0.028*	1	
(9) $Pollution$	0.369	0.483	0	1	0.033*	-0.076*	0.019	0.070*	0.016	0.032*	-0.071*	-0.008	1
(10) LEV	0.499	0.195	0.073	0.882	0.128*	0.076*	0.149*	-0.376*	0.497*	0.069*	-0.049*	-0.193*	-0.059*

(二) CSR 鉴证、董事网络与 CSR 披露质量
 由表 3 列(1)和列(2)可知, *CSRQ* 与 *BI_Assurance* 显著正相关(系数分别为 3.848 和 3.046),说明董事连锁企业的 CSR 鉴证对 CSR 披露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支持了假设 1。引入强制披露压力(*Mandatory*)作为调节变量后,如列(3)和列(4)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6.363 和 4.932),说明强制披露压力显著强化了 *CSRQ* 与 *BI_Assurance* 之间的相关性,支持了假设 2。

(三) 进一步分析

1. 内生性检验

首先,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借鉴梁上坤选择工具变量的方法^[32],并在过度识别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利用 *BI_Assurance* 的行业均值和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GMM 回归分析。如表 4 中列(1)所示, *CSRQ* 与 *BI_Assurance* 显著正相关(系数为 3.821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即使考虑内生性的影响,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然后,加入可能同时影响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董事会特征变量进行回归。由回归结果可知,董事会特征直接影响企业 CSR 行为。规模较大的董事会意味着利益多元化、更坚实的社会资本和更加民主化的决策机制,从而带来更好的 CSR 产出。董事会独立性降低了代理冲突,使管理层更加注重多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董事会独立性显著促进了 CSR。股权集中度越高,董事会多元化程度越低,可能对 CSR 产生不利影响^[33]。

连锁董事构成了董事网络,因此董事会构成能够直接影响董事网络的形成。考虑到董事会构成对董事网络和 CSR 披露两者的潜在影响,本文将相关变量(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股权集中度)添加到模型(1)中来控制变量缺失引起的内生性问题^[34-35]。上述董事会构成相关的 3 个变量均从 CSMAR 数据库获取。董事会规模(*Board*)以董事总数表示,董事会独立性(*IDDR*)以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来表示,股权集中度(*Largest*)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表示。加入三个董事会特征变量后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中列(2)和列(3)所示, *CSRQ* 与 *BI_Assurance* 显著正相关, *BI_Assurance* 与 *Mandatory*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最后,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遗漏变量问题,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中列(4)和列(5)所示, *CSRQ* 与 *BI_Assurance* 显著正相关, *BI_Assurance* 与 *Mandatory*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2. 稳健性检验

第一,为了控制异方差的影响,本文使用了 robust 方法进行 OLS 分析,结果如表 4 中列(6)和列(7)所示, *CSRQ* 与 *BI_Assurance* 显著正相关, *BI_Assurance* 与 *Mandatory*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些结果表明实证结果稳健,没有受到异方差的影响。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1)	(2)	(3)	(4)
<i>BI_Assurance</i>	3.848 *** (5.28)	3.046 *** (4.38)	-1.010 (-0.71)	-0.646 (-0.48)
<i>BI_Assurance</i> × <i>Mandatory</i>			6.363 *** (3.91)	4.932 *** (3.17)
<i>Mandatory</i>			-3.169 *** (-9.75)	-1.699 *** (-5.22)
<i>ROA</i>	-11.722 *** (-3.79)	-0.720 (-0.24)	-10.682 *** (-3.48)	-0.879 (-0.29)
<i>Size</i>	4.626 *** (35.55)	3.940 *** (29.83)	4.962 *** (37.05)	4.157 *** (29.89)
<i>Fshare</i>	8.976 *** (5.39)	11.125 *** (6.88)	9.423 *** (5.70)	10.962 *** (6.79)
<i>PC</i>	-1.149 *** (-2.88)	-0.105 (-0.27)	-1.227 *** (-3.10)	-0.251 (-0.64)
<i>AD</i>	28.190 *** (9.80)	26.198 *** (8.94)	28.040 *** (9.84)	26.649 *** (9.11)
<i>Pollution</i>	0.508 * (1.65)	-0.281 (-0.78)	0.571 * (1.87)	-0.324 (-0.90)
<i>LEV</i>	-9.115 *** (-9.61)	-4.545 *** (-4.63)	-9.185 *** (-9.77)	-4.728 *** (-4.83)
<i>Constant</i>	-64.066 *** (-23.07)	-60.752 *** (-20.49)	-69.895 *** (-24.74)	-64.108 *** (-21.07)
年度与行业	/	控制	/	控制
样本量	5075	5075	5075	5075
R-squared	0.274	0.354	0.288	0.358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下同。

第二,引入强制披露压力的替代变量。相比于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中央企业面临更大的 CSR 披露压力。国务院国资委 2008 年出台《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对国有企业深化社会责任理念、推进社会责任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明确的要求。从更微观的角度看,社会责任也是国企负责人业绩考核的内容之一,国务院国资委令第四十号《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把“鼓励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央企负责人的考核导向之一。在此背景下,央企的 CSR 披露已经非常接近强制披露。本文采用虚拟变量(CSOE)来量化央企控股,当某一企业为央企控股时,CSOE 等于 1,否则为 0。结果如表 4 中列(7)所示,BI_Assurance 与 CSOE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实证结果稳健,强制披露压力强化了 CSR 鉴证的示范效应。

表 4 内生性与稳健性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8)
<i>BI_Assurance</i>	3.821 *** (3.11)	3.160 *** (4.55)	-0.756 (-0.56)	3.046 *** (4.38)	-0.646 (-0.48)	3.046 *** (3.53)	-1.010 (-0.64)	0.720 (0.78)
<i>BI_Assurance × Mandatory</i>			5.255 *** (3.38)		4.932 *** (3.17)		6.363 *** (3.43)	
<i>Mandatory</i>			-1.742 *** (-5.36)		-1.699 *** (-5.22)		-3.169 *** (-10.32)	
<i>BI_Assurance × CSOE</i>								4.457 *** (3.25)
<i>CSOE</i>								1.922 *** (5.35)
<i>ROA</i>	1.154 (0.34)	-0.866 (-0.29)	-1.050 (-0.35)	-0.720 (-0.24)	-0.879 (-0.29)	-0.720 (-0.25)	-10.682 *** (-3.76)	0.994 (0.33)
<i>Size</i>	4.000 *** (26.46)	3.687 *** (26.16)	3.910 *** (26.52)	3.940 *** (29.83)	4.157 *** (29.89)	3.940 *** (27.99)	4.962 *** (36.32)	3.814 *** (28.71)
<i>Fshare</i>	13.058 *** (7.09)	10.911 *** (6.74)	10.702 *** (6.63)	11.125 *** (6.88)	10.962 *** (6.79)	11.125 *** (5.76)	9.423 *** (4.63)	9.928 *** (6.12)
<i>PC</i>	-0.205 (-0.46)	0.007 (0.02)	-0.138 (-0.35)	-0.105 (-0.27)	-0.251 (-0.64)	-0.105 (-0.28)	-1.227 *** (-3.27)	0.095 (0.24)
<i>AD</i>	27.925 *** (8.45)	25.961 *** (8.86)	26.473 *** (9.06)	26.198 *** (8.94)	26.649 *** (9.11)	26.198 *** (8.93)	28.040 *** (9.91)	27.244 *** (9.32)
<i>Pollution</i>	-0.486 (-1.21)	-0.410 (-1.13)	-0.454 (-1.26)	-0.281 (-0.78)	-0.324 (-0.90)	-0.281 (-0.78)	0.571 * (1.89)	-0.211 (-0.59)
<i>LEV</i>	-4.283 *** (-3.88)	-4.455 *** (-4.53)	-4.667 *** (-4.76)	-4.545 *** (-4.63)	-4.728 *** (-4.83)	-4.545 *** (-4.81)	-9.185 *** (-10.53)	-4.883 *** (-4.99)
<i>Board</i>		0.392 *** (4.93)	0.409 *** (5.16)					
<i>IDDR</i>		0.754 (0.29)	0.352 (0.14)					
<i>Largest</i>		0.032 *** (3.38)	0.031 *** (3.30)					
<i>Constant</i>	-53.123 *** (-15.46)	-60.685 *** (-19.90)	-64.067 *** (-20.49)	-60.752 *** (-20.49)	-64.108 *** (-21.07)	-60.752 *** (-20.28)	-69.895 *** (-24.45)	-58.128 *** (-19.52)
Observations	4200	5069	5069	5075	5075	5075	5075	5075
R-squared	0.342	0.358	0.363	0.354	0.358	0.354	0.288	0.360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 CSR 鉴证为切入点研究了董事网络的扩散效应,研究发现:连锁企业的 CSR 鉴证对 CSR 披露质量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即董事网络中的 CSR 鉴证具有示范效应;引入强制披露压力作为调节变

量后发现,强制披露压力显著强化了 CSR 鉴证的示范效应。

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扩展和深化了董事网络扩散效应的形成机制研究。一方面,现有研究没有关注 CSR 鉴证的示范效应,本文的研究从 CSR 鉴证的角度扩展了董事网络扩散效应研究。另一方面,虽然模仿压力理论能够解释董事网络中企业行为扩散的成因,但外部压力对董事网络的具体影响机制还未得到深入研究。本文认为,违反强制披露政策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政策风险和声誉损失,因此外部压力会造成不确定性增加。出于规避不确定性的动机,企业会学习董事网络中的“榜样”企业行为,从而强化了 CSR 鉴证的示范效应。通过引入强制披露政策,本文的研究既深化了董事网络扩散效应的形成机制研究,也为模仿压力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实践意义在于既检验了监管部门 CSR 政策的影响和效果,也为企业 CSR 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证证券交易所的规定,部分企业必须发布 CSR 报告。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现阶段,强制性 CSR 披露质量更高。这说明现行的强制披露政策促进了我国上市公司 CSR 披露的实质性提高。从企业的角度,本文发现董事网络影响了 CSR 披露质量,说明董事网络可以成为企业学习 CSR 披露策略的渠道与平台,从而为企业 CSR 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 [1] Chiu P-C, Teoh S H, Tian F. Board interlock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contagion[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3, 88(3): 915-944.
- [2] Cai Y, Dhaliwal D, Kim Y, et al. Board interlocks and the diffusion of disclosure policy[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4, 19(3): 1086-1119.
- [3] Han J, Hu N, Liu L, et al. Does director interlock impact the diffusion of accounting method choi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7, 36(4): 316-334.
- [4] 陈运森,郑登森. 董事网络关系、信息桥与投资趋同[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3): 159-171.
- [5] 田高良,李星,司毅,等. 基于连锁董事视角的税收规避行为传染效应研究[J]. *管理科学*, 2017(4): 48-62.
- [6] 王莹,曹廷求. 董事网络下企业同群捐赠行为研究[J]. *财经研究*, 2017(8): 69-81.
- [7] Dimaggio P J, Powell W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2): 147-160.
- [8] 谢德仁,陈运森. 董事网络:定义、特征和计量[J]. *会计研究*, 2012(3): 44-51.
- [9] 衣凤鹏,徐二明. 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连锁董事对环境战略的影响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4(5): 24-33.
- [10] 严若森,华小丽. 环境不确定性、连锁董事网络位置与企业创新投入[J]. *管理学报*, 2017(3): 373-381.
- [11] Galaskiewicz J, Wasserman S. Mimetic processes within an interorganizational field: An empirical test[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9, 34(3): 454-479.
- [12] Howard M D, Withers M C, Tihanyi L. Knowledge depend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director interlock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60(5): 1986-2013.
- [13] Srinivasan R, Wuyts S, Mallapragada G. Corporate board interlocks and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8, 82(1): 132-150.
- [14] Dhaliwal D S, Oliver Zhen L, Tsang A, et al. Voluntary nonfinancial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initi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J]. *Accounting Review*, 2011, 86(1): 59-100.
- [15] Dhaliwal D, Li O Z, Tsang A, et 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roles of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and financial transparenc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Public Policy*, 2014, 33(4): 328-355.
- [16] Plumlee M, Brown D, Hayes R M, et al.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quality and firm value: Further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Public Policy*, 2015, 34(4): 336-361.
- [17] Matsumura E M, Prakash R, Vera-Muñoz S C. Firm-value effects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disclosures[J]. *Accounting Review*, 2014, 89(2): 695-724.
- [18] Peters G F, Romi A M.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ssurance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5, 34(1): 163-198.

- [19]沈洪涛,陈涛,黄楠.身不由己还是心甘情愿: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决策的事件史分析[J].会计研究,2016(3):79-86.
- [20]徐细雄,李瑶琴.社会责任报告审计能否提升CSR信息披露质量?——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6):46-56.
- [21]张正勇,戴泽伟.财务透明度、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效应[J].管理科学,2017(2):132-147.
- [22]耿艳丽,鲁桂华.企业诚信影响审计收费吗?——基于纳税诚信的经验研究[J].审计研究,2018(1):68-77.
- [23]耿艳丽,鲁桂华,李璇.纳税诚信企业更容易获得商业信用融资吗?[J].管理评论,2021(3):269-281.
- [24]杨金凤,陈智,吴霞,等.注册会计师惩戒的溢出效应研究——以与受罚签字注册会计师合作的密切关系为视角[J].会计研究,2018(8):65-71.
- [25]张正勇,胡言言,吉利.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降低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吗?[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7(5):85-95.
- [26]张正勇,邓博夫.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吗?[J].财经论丛,2017(5):60-68.
- [27]朱文莉,许佳惠.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2):43-53.
- [28]Khanna V, Kim E H, Lu Y O. CEO connectedness and corporate fraud[J]. Journal of Finance, 2015, 70(3): 1203-1252.
- [29]Sun W, Zhao C, Wang Y, et 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and catering to investor sentiment in China[J]. Management Decision, 2018, 56(9): 1917-1935.
- [30]Aguinis H, Glavas A. What we know and don't know abou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38(4): 932-968.
- [31]Chatjuthamard P, Jiraporn P, Tong S, et al. Managerial talent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How do talented managers view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2016, 16(2): 265-276.
- [32]梁上坤.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影响公司费用粘性吗?[J].管理世界,2018(12):133-148.
- [33]Jain T, Jamali D. Looking inside the black box: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6, 24(3): 253-273.
- [34]陈旭东,杨硕,周煜皓.政府引导基金与区域企业创新——基于“政府+市场”模式的有效性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11):30-41.
- [35]杨金凤,孙维章,杨洋.CEO权力、企业战略与审计收费[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9(1):99-113.

[责任编辑:高婷]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Director Network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surance: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Mimetic Pressure Theory

SUN Weizhang¹, GENG Yanli¹, YANG Jinfeng², WU Shuchang¹

(1. School of Accounting,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25010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n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CSR assurance in board networks. Using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CSR assurance of interlocked enterpris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CSR disclosure. Introducing mandatory reporting pressure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it is found that external pressures strengthen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CSR assurance, which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mimetic pressure theory.

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network of directors; CSR assurance; diffusion effect; interlocking director; mimetic pressure theory; demonstration effect